

本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主义 与乌托邦主义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美] 莫里斯·迈斯纳 著

Maurice Meisner 译

张宁 陈铭康 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美] 莫里斯·迈斯纳 著

张宁 陈铭康 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美) 迈斯纳著; 张宁, 陈铭康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石仲泉, 萧延中主编)

ISBN 7-300-06245-8

I. 马…

II. ①迈…②张…③陈…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②毛泽东思想-研究③乌托邦-研究

IV. ①A81②A84③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0497 号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美] 莫里斯·迈斯纳 著

Maurice Meisner

张宁 陈铭康 等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8.25 插页 2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4 00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1981年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之际，毛泽东主义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公布了他们拖延已久的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地位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冗长的决议，虽然断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但对他最后20年的领导工作，仍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决议开了一个长长的清单，历数了毛泽东从“大跃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浩劫”所犯的“左”倾错误及其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恶果。按照官方的评价，毛泽东晚年最突出的错误之一，是曾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空想的”、“非科学的”那种政治和思想倾向。毛泽东被指责“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沉溺于“脱离实际的”思想和实践方式，对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到来抱有完全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谴责毛泽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方面，西方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学者，长期以来走在中国现在的政治和思想领导人前面。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大多数外国学者就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与可能是普遍必然的现代经济和政治发展过程完全不一致，是轻率的空想，荒谬的狂热。在毛泽东主义时代，有不少其他西方评论家曾在毛泽东主义中发现了非常之多的优点，但他们现在终于认识到，他们观察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既然北京方面已正式揭露了这些错误），并且加入了对毛泽东的继任者奉行的新路线的普遍赞扬之中。研究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学者和大多数西方学者，异乎寻常地同声称颂中国新领导人的“实用主义”和他们对“四个现代化”的认真追求。

像在北京领导人和外国评论家中流行的方式一样，把毛泽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丢进历史的垃圾堆，自然是非常符合时代的普遍倾向的。因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对未来美好社会的乌托邦幻想，不

仅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在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世界中，已经差不多消失了。弗兰克·曼纽尔和弗里奇·曼纽尔敏锐地判定，如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在自己技术的社会重负之下被压垮的话，它们就要忍受令人痛苦的自我矛盾：

正当新的、辉煌的科学力量变得对我们有用之时，我们却面临一种贫困——缺少对乌托邦的虚构想象……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现在能够以合理的精确度，略述在中间空虚的彗星或小行星上建立一个太空移民聚居地所必需的过程。但当描述人们在那儿将要做什么时，这个领域中最活跃的人物也只是在一个无重力的新环境中，为我们重现了包括花园俱乐部和其他一切在内的城市郊区。

两位曼纽尔有很好的和更充分的理由对如下现象大发感慨：“制造一切可能的东西的科技手段的积累与可悲的目标贫乏之间脱节。”^①

在某些共产党国家里，目标的贫乏同样令人可悲。在过去数十年里，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似乎是未来的希望，而现在则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并未产生。现代经济发展目标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想——与此相应，某些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几乎变得和一些现代流行的思想别无二致。而思想宣传仅仅用来掩盖官僚主义作者们陈腐的民族主义目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世界工业舞台上的后来者，它们仿效资本主义前辈“积累着技术手段”，上演着历史的模仿剧。

我们的时代，是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经历着可怜的目标贫乏和令人震惊的缺少幻想的时代。对于想象人类的未来要比现代工业社会包含更多假定的“合理性”的人们来说，匆忙地称赞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乌托邦思想的再现，也许还不是时候。毛泽东

^① Frank E. Manuel and Fritzie P. Manuel,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811.

主义的乌托邦思想的烙印可能不再和政治有任何关联，但它确实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它的意义应当用历史上的和从人的角度能理解的语言来领会。把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作为一种不幸的历史失误加以消除——不管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还是由公认的“现代化过程”的理论家来完成这种消除——无助于促进人们理解过去，也不会像以往那样，为那些仍然憧憬和争取新的更美好的未来的的人们，提供本来必需的指导。

本书是一个探索，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从不同的理性和历史的出发点探索毛泽东主义思想中那些空想方面的互相联系的过程。它首先是关于毛泽东主义的思想史的研究，应当着重指出，这个研究限于（和限定在）与毛泽东的思想的空想方面直接相关的论题和问题上。当然，毛泽东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思想，但从整体上讨论毛泽东主义的理论或由它而来的政治实践，不是眼下进行的探索的目的。但毛泽东思想的空想方面在历史上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本书也不希望仅仅是一种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虽然毛泽东的“空想”确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正统观念，但下列各章将会表明，这对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遗产改造为在现代中国历史环境中切合革命需要的学说，还是必不可少的。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在革命胜利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很多独具特色的东西之所以形成，同1949年之后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不是舶来的思想珍玩，而是一种与现代和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紧密相关的历史现象。

xii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评估毛泽东主义时代的历史成果。在早先的一本书里，我提出了我一直坚持的看法——毛泽东主义试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断言，尽管这个尝试在历史上值得注意，但人们最终将会发现它离目标还很遥远。^① 毛泽东像大多数革命家一样——也许比他们更为热心——竭力要在他的时

① See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代获得在历史上不可能达到的东西，以便获得可以得到的东西。但凡历史评价，无论哪一种，总想切近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的时代（历史评价没有一锤定音的）。毛泽东主义的时代将作为伟大的乌托邦插曲之一记载在世界历史上，试图理解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世界的命运和乌托邦主义的作用的人们，不管其政治信仰如何，都将继续关心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在经历了缺乏乌托邦憧憬的年代之后，这也许是值得回顾的历史。

本书的八章中有五章原来曾作为文章发表过。感谢这些文章原来的出版者，他们同意我将这些文章收入现在这本书中。这五篇文章（第二、三、四、五章和第七章）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现在北京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时期写成的，它们无疑带有那个时期的痕迹和缺点。但既然我现在和当时对毛泽东主义性质的看法实质上是一样的，我就不打算为在历史上充当事后诸葛亮所能偶尔得到的可疑的好处去重写它们。除了风格上的变化以外，它们在内容和阐述方面仍保持了原先写作的样子，未做任何剪裁来适应当前流行的说法。有三章（第一、六和八章）是专门为本书准备的。

xiii 谨向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学术研究委员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致谢，他们给我提供了写作本书的大部分自由时间。我特别感谢林恩·卢伯克曼，他的意见和洞察力对本书的内容有很大贡献。此外，他为筹备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部分必需的工作。我也要感谢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伊丽莎白·斯坦伯格，她是使我思想振奋、得到精神鼓励的永久源泉。我把这本书满怀深情地献给我的儿子杰夫，他将把对现代技术带给人类的益处的赞赏同对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的社会幻想结合起来。

莫里斯·迈斯纳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1981年8月

总 序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 20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下，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内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阈和理解，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部分佳作，编成“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纪念这位旷世伟人，并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我们选译的基本原则是，站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严格遵奉学术理据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历史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观念冲突，也在选择范围之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把这一睿智古训真正转变为学术行动。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项目，是这个教学科研共同体集体努力的成果之一。我们期望这次翻译的几部著作不是译介编研工作的结束，而是一项系统科研工程的开始。我们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出版之际，我们首先感谢以下诸教授：

史华慈 (Benjamin I. Schwartz);
斯图尔特·R·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 (John Bryan Starr);
布兰特利·沃马克 (Brantly Womack);
罗斯·特里尔 (Ross Terrill);
杨炳章 (Benjamin Yang)。

这些教授不仅慷慨允诺让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而且其中不少人专此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撰写了“中文版序言”，这无疑是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龚育之、金冲及、李君如和李忠杰等教授，不仅慨然允诺担任本译丛的学术顾问，而且多次对翻译工作给予指导，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还就统一国外著者的译名作了专门指导，使翻译工作避免了不少差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专家们，在学术方向上的直接指导以及在史料的校译、勘误方面所提出的大量关键性意见，使本译丛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来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编委们，从不同学科的多元视角，为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人员前此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编选以诸多经验和启发，而且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便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本译丛的学者和单位，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者，均已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了核校；凡确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了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

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石仲泉 萧延中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一个严酷的悖论。在人民共和国早先的几十年间，那时中国还很贫困，物质匮乏成为其追求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各种景象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天，当中国从经济匮乏状况急速转变到一种相对富裕的境域时，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乌托邦景象则几乎被人们遗忘。正当社会主义的客观情景被逐渐现实化之时，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观意志则有所消解。

如何解释这种不和谐呢？对许多观察者来说，这个貌似真实的悖论能被简单地加以阐明。在马克思的乌托邦阅读与经济不发达的联想之间，历史地存在着一个合乎逻辑的组合，对此存在着广泛的争议。这些观察者的观点被称之为具有影响力并被泛化了的“现代化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诉求与其说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毋宁说主要是针对一个前工业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各种冲动和人们的心理现象，这种社会则仅仅开始一个现代工业主义痛苦的旅程。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所针对的问题，是在早期工业化社会中，人们根除传统经济模式的主观意愿和满足社会生活的心理需要，这种意愿和需要表达了一种被浪漫化了的，但却又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殇逝乡愁，并刺激出了平等主义乌托邦的未来幻梦。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被知识精英所独占，并被发展成为一种形式上的意识形态。但是当下的这次现代工业进化已经发展到如此充分成熟的阶段，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已失去了其历史的“活的灵魂”（raison d'être）。教义变成了仪式，并最终逐渐褪色消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在无产阶级的形式中生产了自己

的掘墓人一样，现在，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在为现代工业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形式中生产出了对自己的否定。

这种理论还认为，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者在无产阶级的形式中生产了自己掘墓人的这一命题，是在不发达的经济土壤中开花结果的。在这里，它被转换成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即与“批判的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新形态——译者注），并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被马克思主义所激发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各式革命，已经被限定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之中，这毕竟是20世纪历史的一个显著事实。而且根植于这一土壤之中的社会主义政权，在经过一个工业发展时期之后，已经或早或迟地把自己容纳进了占优势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规范之中。

总之，几乎所有各种版本的“现代化理论”都假定，一个充分发展的经济，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于任何形式的乌托邦主义来说，都是无益的。这种争论正在由它所唤起的准辩证法意象的形式（意指所谓“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在为现代工业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形式中生产出了对自己的否定”——译者注）中进行着。

然而，在我看来，虽然这些争论目前仍然被充分地关注，但我们没必要对此纠缠不休。因为这样就将把人类交付给久远的资本主义未来去托管。这种未来当然是一种广泛的假设。借用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所预期的普世性话语来说，就是人们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高声预言：我们正在迈向“历史的终结”，未来肯定是一个当下之逐渐延伸的平庸信念。但是，对于那些把历史视为过程而不是停滞的思想来说，“历史终结”的观念则是一种沮丧的期待。而且，这种关于历史在其现行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走到了顶点并且已经终结了的假设，使人特别地悲哀。然而，就资本主义而言，其自身巨大的生产力已经带来了不断拓展的开发、日益增长的异化、各民族间怪异的不平等，以及更加致命和愈加频仍的战争，而且这些都在一个日益增加且规模极大的范围内持续地展开着。那些能创构不同且更好未来的人们，假如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他们为“乌托邦徒”（“utopians”），将会拒绝关于在现行美国这一占主导地位的资

本主义典型化身之中，历史已经走向终结的观念。

对那些不屑于“历史终结”诡称而继续为完全崭新和真实的人类世界努力奋斗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将会对他们有所助益，这也是作者所期望的。但也必须承认，这部由8篇论文所组成的论著，对于未来所提供的消极教训要多于积极范例。这些论文大多数是在社会主义景观曾经昌盛之时，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时代所做的研究，是关于当乌托邦期望远远超越了其赖以实现之物质基础之时所发生的事情。大跃进运动（campaign）的悲剧就是这种多重不和谐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然而，今天的中国正在开始享受半个世纪巨大经济进步所产出的果实。或许，新生的几代人将会着手把新增的物质成就与旧有的社会主义期望结合在一起。把成长中的物质丰盛与经一个多世纪奋斗所锻造出来的强劲革命传统相结合，这可能是给中国在现代世界历史中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理想，提供的最好机会。

莫里斯·迈斯纳

2003年12月于美国威斯康星州

译者序

迈斯纳教授是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现为美国历史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他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围绕毛泽东的思想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著述有：《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国共产主义理论中的苦行主义价值观和乌托邦目标》、《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民粹派观点》、《毛泽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和中国社会的前途》等。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是他在这一研究领域所撰8篇论文的合集，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他的观点。此书英文版1982年问世，以后又得到多次再版。此后，迈斯纳教授又出版了长篇巨著《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其研究著述以理论逻辑的一致性和鲜明的个性表达而著称，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迈斯纳教授的这本文集，用了较大的篇幅，探讨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同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乌托邦观念的关系。迈斯纳教授对毛泽东的某些乌托邦观念的理论实质，产生的思想和历史原因，在政治经济理论、价值观、理想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种种表现形态，做了富有深度和特色的系统分析。他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他认为：“如果说毛泽东主义没有在中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它确实造成了一个持久动荡的革命形势，为达到（或至少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马克思要改变世界而不是简单地解释

世界的指令是衡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的话，那么，与列宁主义者相比，毛泽东最后或许可以被认定是一个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假如毛泽东的非列宁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最终会以某种方式来推进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进行探索的话，那么，这可能是一切悖论中最为奇怪的一个。”（见本书第108~109页）此段论及毛泽东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迈斯纳教授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对其进行了富有深意和比较中肯的理论概括。诸如这样的评论，在本书处处可见，恕不赘引。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这部名著中，迈斯纳教授还通过自己独特、清晰的思想史分析，透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进程。他认为，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并非同义语，并注意到在这场巨大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诸如腐败和两极分化等令人十分忧虑的现象。其本质是对西方世界普遍的“现代性”症候的深刻透视。在以后的许多论文和辩论中，迈斯纳教授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并反复声明他自己的观点是基于对马克思本人理论原理的真正理解和时代解读。现在看来，迈斯纳教授的“问题意识”是深刻的，并且他提出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上下的高度关注。一位西方学者早在20多年前就能对此问题有所觉察并提出尖锐的批评，这一方面说明了理论认识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一位严谨学者的思想洞见，这无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研究方法上，迈斯纳教授广泛运用的比较研究法也是值得赞许的。他以马克思、列宁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作为参照系审视毛泽东的观点和思路，确实有助于人们拓展思维空间和理论视野，深化对问题的思考，值得国内理论界借鉴。我们更看重迈斯纳教授提出的问题、观察的角度和研究的思路所具有的独特性，这将促使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是为社会进步而向历史寻求智慧，即使是对立观点的激烈碰撞，也会以迸发出的火花为我们照亮探索的道路。

这些都是我们选择译介此书的重要理由。

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我们也认为迈斯纳教授有些观点的立论值得商榷。例如，他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乌托邦观念的实质，是否认或忽视社会化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试图在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以此为基点，毛泽东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依靠力量问题上形成了实际上轻视工人阶级而重视农民的倾向，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形成了立足农村的反城市倾向，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唯意志论倾向。我们认为，一方面，迈斯纳教授的有些观点不是不可以继续研究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指出一些基本的事实。毛泽东是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系列问题的。毛泽东的观点和思路无疑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但在社会主义要不要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这个问题上，他却从未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产生过怀疑。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都反复强调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一再以近百年来中国因落后而备受屈辱的惨痛事实唤起人们对此的高度重视。至于怎样才能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则有不同的考虑。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实质上是要以这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替代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实际上表明他形成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改造可以同步进行的新思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之后，毛泽东探索的则主要是如何在新制度下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方法问题。尽管这种观点和思想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确有脱离实际的缺陷和失误，但它们在整体上毕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的问题上，也应指出如下事实：第一，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坚定地以无产阶级作为领导力量，对此从未有过任何怀疑。第二，由于农民在总人口中占很大比重，无产阶级在革命和建设中必须以广大农民作为最可靠的同盟军，领导他们共同前进。这是毛泽东的一

贯思想。这种思想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第三，毛泽东对个体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两重性，始终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开始时一再告诫全党，“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第四，长期在农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无疑使毛泽东更了解农民，并有意无意受到农民意识的某些影响，但显然不能就此得出毛泽东只是代表和依靠农民的结论。

迈斯纳教授是在马克思早期关于社会异化的理论框架内评述现代中国的伟大社会改革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亲身经历者和历史见证人，我们虽然理解和尊重迈斯纳教授严谨的理论推导，但是仅在美国中部安静的书斋里，是推导不出 13 亿人应该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结论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收益都同时意味着付出代价。绝对的理想状态只是准则而不是教条。对迈斯纳教授把改革开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与这场伟大变革所创造出来的多方面价值等量齐观，甚至把改革开放的理论同毛泽东的思想和现代化建设做简单二元对立的观点，我们不能表示认同。对于书中其他类似的观点，我们相信中国的广大读者能够做出正确的评估和判断。

最后，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个涉及历史分析的学术术语的使用问题。迈斯纳教授著作中所使用的一个核心分析概念是 populism，通常译为“民粹主义”。把 19 世纪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分析方式和话语路径直接引用到现代中国历史情境中，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细致地探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民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还不如说是一种超意识形态和超政治体制。正如有人形象地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政治涂料”，它可以涂在截然相反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迄今为止，它不仅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等联姻，而且还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权威主义等结合；它不仅为社会党、民主党、共和党和绿党所使用，也为法西斯主义者、无政